

关于《仇庄项目/Qiuzhuang Project》 - 来自Van Abbe美术馆的收藏

李牧

2010年5月，我被邀请参加Van Abbe美术馆在上海的展览《双倍无限》(Double Infinity)(由Arthut Asia 和 Van Abbemuseum主办)，当时我提交了两份方案，一个是在展览期间我作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为整个展览工作，并且得到欧洲美术馆工人标准的工资（《新工作》）；另一个是把美术馆的收藏运到我的老家，江苏省北部的一个村庄进行展示。最终美术馆选择了我的第一个方案在展览上实施。

在展览的开幕晚宴上，我和Van Abbe美术馆的馆长兼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查尔斯·埃申（Charles Esche）（另外三位策展人是Defne Ayas, Davide Quadrio, Remco de Blaaij）聊起我的村庄，然后我们谈到把Van Abbe美术馆的收藏品在我的村子里展出的想法，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第二天再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打算邀请你来荷兰Van Abbe美术馆，然后我们商讨如何完成你的想法。



我的村庄叫仇庄，是中国江苏省最北部丰县孙楼镇朱窑村下面的一个自然村。1974年，我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并且在这里长大，17岁的时候我考取了苏州工艺美术学校离开了村子。之后，无论我继续读书还是参加工作，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回到村子里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村子是十分美好的，那时候人们普遍都很贫穷，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融洽。村子里有各种不同的树木，不同的季节总是有不同的花和果实。一条小河从我家门前流过，一到夏天我就整天泡在河里捉鱼和游泳。

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越来越不喜欢我的村子。随着我的长大，也随着我们的国家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主导方向的发展，村子开始变化，变得越来越让我对它的感情复杂起来。村子周围多了很多小型的工厂，以木板加工为主的作坊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占用了大量的农田，并且制造出大量的垃圾和噪音。孩子们鲜有考取大学的学生，多是到了初中就辍学在家务工挣钱。村里到处弥漫着拜金主义和读书无用的说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以利益为主导，人们变得自私而狡猾。村子里的小河成为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道路上在雨天积满了淤泥和污水，因为村民们都不断把自家的院子垫高，导致没有下水系统的道路变成了河流。村子里再也看不到开花的树，村前屋后都被能快速生长的白杨树替代。

我很庆幸我能离开这个村子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事业，我希望我能逃离的越远越好。因为它带给我的除了沉重，还是沉重。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不管逃的有多远，我都无法在精神上摆脱它。因为在我的精神深处，我所有的思维和习惯，我的恐惧和彷徨，都来自我在这个村子里成长的经历。我递交给VAN ABBE美术馆的方案并不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本能的设想。我对自己的想法有些吃惊，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敢于回头面对我的村子了。我知道，战胜恐惧的唯一方法是面对恐惧。我所拥有的武器，是我的知识和艺术。



2011年6月，我到荷兰Van Abbe美术馆进行为期两周的考察。Van Abbe美术馆在荷兰的南部工业城市埃因霍温(Eindhoven)，一个像中国的县城一般大小的城市。美术馆里收藏了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彼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里西斯基（Ei Lissitzky）、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约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索·勒维特(Sol LeWitt)、丹·弗莱文(Dan Flavin)、乌拉和阿布拉莫维奇(Ulay/Abramovic)、布鲁斯·诺曼（Bruce Nauman）、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等艺术家的重要作品。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安静而礼貌，美术馆给我的感觉却是井然的秩序下暗藏着如潮般的新鲜学术思潮。我整天都在美术馆、图书馆以及仓库中观看他们的收藏，我对于极简主义的藏品很有兴趣，似乎那些作品的秩序和规整正是我的村庄缺少的东西。我在二楼的展厅遇到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创作的三幅毛泽东肖像，这让我想起在我的少年时代，每个家庭都要悬挂领袖的肖像，相同的肖像，现在是波普艺术的经典之作。

期间，我去拜访了当地的艺术家、设计师约翰·考美林（John Kormeling），他曾经设计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荷兰馆“欢乐街”，并且有作品在《双倍无限》展览上展出。他的工作室是一幢独立的小楼，他把它漆成了白色，远远看去很像白宫，只不过里面更像一个混乱的作坊仓库，要腾出一块坐下来的地方都不容易。我谈起我的村庄、谈到很多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家并不亲手制作作品、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关系时，他若有所思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两枚印章印在我的笔记本上，一个是“ORIGINEEL”（原作），一个是“KOPIE”（复制）。他问我：到底哪个是原作，哪个是复制品呢？刹那间，我明白我是不需要把Van Abbe美术馆的原作运到我的村子，因为在本质上，原作和复制品是没有差别的。是否原作，对于村民来说没有意义，而只有对于参与进艺术规则中的人才会在乎。第二天我告诉查尔斯（Charles Esche）关于我和约翰·考美林（John Kormeling）的见面，以及我决定将Van Abbe美术馆的部分收藏复制进我的村子的想法，他很欣然的接受了这个想法。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选择哪些藏品进入村子。



2012年12月,我回到我的村子并开始着手做这个项目。我希望时间成为这个作品里的内容,一是因为艺术作品的制作和实施需要时间,二是因为要看到艺术和村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需要时间,因此这个项目将持续到2013年7月。我的工作从一个设置在村子里的图书馆(A LIBRARY/A图书馆)展开,因为我需要一个媒介或者桥梁来建立我和村民之间的关系,而图书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既是通往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也会帮助我们彼此了解。通过图书馆,我得以慢节奏的传播我的知识和经验,让村民了解我,接纳我接下来的工作。图书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主要的图书来自我的收藏和其他艺术机构和杂志社的捐赠。无论孩子和成人,我都希望图书馆能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提醒自己,我并不是要将图书馆发展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而是探讨这样一个空间在村子里更多的可能性。当项目结束的时候,这个图书馆将作为一个持续的项目继续留在村里。

我从Van Abbe美术馆的收藏中选择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约翰·考美林(John Kormeling)、丹·弗莱文(Dan Flavin)、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索·勒维特(Sol LeWitt)、理查德·朗(Richard Long)、乌拉和阿布拉莫维奇(Ulay/Abramovic)、卡尔·安德鲁(Carl Andre)、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等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复制。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是以我是否能够从作品和我的村庄之间找到某种联系或者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为出发点。比如,我选择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三幅《毛泽东》(Mao Tse Tung)丝网印绘画,是因为毛的肖像是村民最为熟悉的图像,多年前每个家庭都要悬挂毛的肖像,今天他也是趋吉避凶的吉祥物。村子里沿路有很多房屋的墙壁,我选择在这些墙壁上绘制索·勒维特(Sol LeWitt)的墙上绘画,我相信由村子里的工人绘制的墙上绘画和由索·勒维特(Sol LeWitt)的工人绘制的绘画是相同的。而索·勒维特(Sol LeWitt)的抽象雕塑在我看来是具有实用功能的,免费的抽象雕塑复制品可以被村民们使用在他们的生活中。我在村子里的公共空间重新制作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Wood Circle”,因为树枝是村子里最常见的材料,我希望这件作品从美术馆重新回到村庄,回到自然中去。乌拉和阿布拉莫维奇(Ulay/Abramovic)的行为表演录像将被展示在村子里的商店里,商店是村子里人们购买日常用品的地方,也是人们聚集的地方,而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表演是不需要多少知识背景也能被理解的艺术作品。

在给策展人查尔斯·埃申(Charles Esche)和乐大豆(Davide Quadrio)沟通时的信中,我说:我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在这个村子里成长并离开,我的亲人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如今,我回到这个村子,我用艺术、知识和经验和我的村子建立一种关系,探讨彼此的相处方式和影响的可能性,或许,我能够通过这些活动找回我自己,找回我的方向。我想,一个艺术项目不管有多复杂和庞大,它始终都不应该偏离的是,这是关于一个人的项目,它应该始终保持着个人的温度。

2013.1.25 中国仇庄

英文翻译:葛拂兰(Francesca Girelli)、袁醉文

注:A图书馆项目的方案源起并展示于独立策展人比利安娜·斯瑞克策划的“未来机构”档案展览。